

师道



口述历史中

的
复旦名师文化

陈雁 主编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013043407

K825. 46

168

仅委员会
编

师道



口述历史中

的
复旦名师文化

陈雁 主编



北航

C1650842

K825.46

168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复旦大学文化建设委员会编,陈雁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9-08904-2

I. 师… II. ①复…②陈… III. 复旦大学-教授-访问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430号

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

复旦大学文化建设委员会 编 陈 雁 主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8 千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8904-2/K · 368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侵权必究



北航

C1650842

目 录

于同隐	1
史玉泉	21
宁树藩	39
濮之珍	60
潘纪一	84
程雨民	99
胡景钟	116
刘星汉	132
沈伯坝	152
叶孝信	180
李致勋	201

伍柏麟	217
顾国祥	236
曹小定	251
郁庆福	276
丁淦林	297
曹沛霖	330
高 滋	359
庄锡昌	385
刘放桐	412
编者后记	432

于同隐

1917年出生,江苏无锡人,著名高分子科学家和化学教育家,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者之一。1938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重庆兵工署材料研究所工作。1943—1946年任浙江大学助教和讲师。1947年公费赴美留学,1950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助理。1951年,辗转回国,出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根据国家发展高分子工业的迫切需要,受命筹建化学系高分子研究所和高分子教研室,任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任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主任。1978—1986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二十一届理事会理事。1982年,出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于同隐教授长期从事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学术上突出的成就包括开发了对生产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不等活性缩聚动力学这一新领域,和以高分子硬弹性理论研究为基础,研制成功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

访谈人:房正 万霞 李焱宏

访谈时间:2009年6月

访谈地点:于同隐教授家中

烽火年代

万:于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童年的事情吗?

于:都过去好多年了,早忘记了。我是无锡人,我小时候都是旧军阀,还不是蒋介石的时代,是旧军阀内战,打来打去,一会这个军阀来,一会那个军阀来,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安定的。到后来蒋介石来了,比较稳定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好。一下子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一来,那不是要逃难吗?我们小时候和你们不一样,我们都是军阀打来打去,这个社会不怎么安定,国家也不富强。

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在天津的工厂里面上班,家里只有母亲。我很早就入小学读书,那时已经不读私塾了,初中上完读高中,高中后就上浙江大学。小学时成绩没什么概念,大学时成绩还可以。

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化学感兴趣的?

于:中学有个化学老师,化学教得很好,从这开始我就对化学很有兴趣,后来就读了化学。老师叫张式之。我决定读化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李:您当时读的是哪所高中?

于:无锡中学,是省立的。后来的无锡中学从高中变成师范学校了,后来我们都调到了苏州中学读书,所以我毕业时是在苏州中学。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高中时我得了伤寒。现在得了伤寒,很快就可以好,但是当时我伤寒病了半年,好在学习并未受太多的影响。分数也够了大学的分数。

李:那时候升学压力会不会很大?

于:升学压力基本不大,那个时候读书的不多,不像现在,是个人都

读大学,那个时候中学又不多,有的只读到小学,有的只能读到中学。我记得我高考是到复旦大学来考的,考到浙江大学的化学系。那个时候浙江大学是很好的,化学系也还可以。

浙江大学那时候大概五六百人,我们一个班只有几个人。1938年日本人开始打过来,我们逃难逃到江西,从浙江的建德逃到江西的吉安。有个流亡大学的电影^①就是关于浙江大学的,浙大从浙江逃到江西,然后逃到贵州。当时条件很艰苦,铁路是从浙江开往江西的浙赣铁路,车子是新的,比较小。我们从杭州乘火车,乘火车就乘了1个月,后来火车头都逃走了。我们上不了火车,即使上了火车也没用,火车走不了。我们就在站台上打电话,问火车头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的火车是轻轨,不像现在的铁路是重轨,铁轨的高低不一样,有接头接起来的。我们被扔在轻轨上没有人接,又没有火车头。在浙赣线上走了好久,后来到了江西樟树,是靠着火车尾的动力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们临时上课的地点。设备都用卡车运过来。后来又跑到浙江建德,在建德停下来,但是随后又搬到江西吉安。我是在江西鹰潭大学毕业的。拿到毕业证书,我就到重庆工作去了。

房:找的是什么工作呢?

于:兵工署材料试验所,这个属于军政部。那时有不少工厂内迁去了重庆,有很多炼钢厂,我们主要就是为炼钢厂服务。我在里面就是做化学分析,做实验。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重庆那时候很可怜,我们吃的米就是军粮,材料试验所是兵工署的,兵工署属于军事机关,军粮你们不能想象啊,里面有很多石子、沙子、糠,在这样的饮食条件下,我得了胃病。重庆买不到药,要去上海买了药寄到重庆来。这样工作了几年后,我就去了昆明。在昆明化工厂工作,这个工厂是生产钛酸的,你们恐怕不知道,中文名称就是小苏打。在昆明用古老的方法生产小苏打。我

^① 电影《流亡大学》,向梅、刘子枫等主演,1985年首映,剧情以抗战时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为背景。

们是厂里的技术员,实际上就是管工人的,也算是工程师。

后来我觉得“蒋家”人管的工厂都是腐败得不得了,就从昆明回到浙大。那时浙大在贵州,我去做了助教。那里浙大很苦,学校没有房子,在庙里上课,住也住在庙里面。以前没有电,都是用酒精点灯,但贵州没有酒精,我们就用木炭来生火,贵州木炭很多,学会了用木炭生炉子,然后才可以做饭。我在浙大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王葆仁^①先生,他就是搞有机化学的,后来也搞了高分子。

后来抗战胜利了,政府开始接手各地的工厂,工厂缺管理人才。那时候美国人按照租借法的规定,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叫租借奖学金,美国人出了一些钱,可以资助去美国留学,“蒋家”希望培养这些人回来管理工厂。我在重庆参加的考试,全国大概有一二百人通过这个去美国留学。

留 学 美 国

于:我们中学开始学英文,英文能看,但讲就不行,所以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就很好笑了。我们乘轮船到旧金山,在饭店里面想吃什么都说不出来。到后来我们就只能吃鸡蛋了,只会说鸡蛋啊。口语要慢慢来的,后来要上课,经常听,总归是会懂的。从旧金山,乘火车到密歇根,密歇根大学,那是1947年。

^① 王葆仁(1907—1986),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著名化学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193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博士学位。1935年秋,应德国慕尼黑高等工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歇尔(H. Fischer)的邀请,赴该校任客籍研究员。1936年,回国创建同济大学理学院和化学系,兼任理学院院长与化学系主任,成为当时同济大学首次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葆仁随同济大校内迁。1941年,王葆仁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聘请,前往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兼任该校教务长。1951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986年病逝。是我国高分子学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为中国的物理化学工程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密歇根,我先读硕士,一年后就硕士毕业了。博士我读了两年多。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去玩,也没有钱,又不要上政治课,所以我两年半博士读好了。我在那里学有机化学,我们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用功,所以学起来也不困难。一般中国学生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是有些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特务,他们那些人成绩就比较差,他们也是学生,他们表面去读书嘛,实际上是特务,目的就是监视这些中国学生,根本不是来读书的,他们读一个博士老是读不出来的。

房:那给的奖学金可以供你们读完这个学业吗?

于:不够,不够,奖学金也只给了我们一年,我们每个人都要打工。美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我们真正的美国朋友不多的,交的朋友都不是美国人,不是美国种的美国人,是外面来的人,比如德国来的美国人。很难融入真正的美国人圈子。我在密大的导师现在还在啊,叫史密斯,他比我年轻啊。没有我年纪大,也已经退休了。

房:那您博士读完以后,在美国工作了吗?

于:在美国工作了半年,在密歇根大学做了半年研究助教。那个时候回不来,美国人是希望我们回国的,希望我们留在美国。那个时候回来很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护照,美国人不允许我们回来,我们的很多申请书美国人都扔掉。

于:在密歇根大学,那时候我和朱光亚^①在一起工作。他是组织派来领导的,他在留学生里搞了些活动。那个时候美国有很多中国的组织,朱光亚是这些组织的领导。我实际上出国之前对共产党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我在其中也谈不上担任什么职务,只是参与一些工作吧。我

^① 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两弹之父。1946年9月,随吴大猷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1949年获博士学位。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呼吁、鼓励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中国留学生取道香港回国,在回国的轮船上,朱光亚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表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在朱光亚的领导下,当时密歇根大学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

不断地给美国的移民机构写信,申请回国。看见我写了七八封信,美国移民局也就同意了,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买船票的证明。我马上买了轮船票,从旧金山乘轮船回来。只能先到香港,我们没有护照,香港也不让登陆,把我们这批人禁闭在轮船的一个舱房里,不让进香港,中国政府就派了一艘小船来把我们接到了广东。交大有个教授叫陈铁云^①的,也是跟我同船回来的。

我是在美国结婚的。我太太^②是我在美国时的同学。我的学位是先得到了,我的夫人的学位是半年以后才得到的。我当时就等她得到学位,在那里做了半年研究助教,等到她得到学位了以后,我们再一起走。她是女孩子,有组织可以培养女孩子,她拿了一个奖学金^③出去留学的。她是学分析化学的。回国后,我们一起到浙大教书,后来也是一起到复旦教书。

房:都是一起在浙大任教?

于:对,然后一起调到复旦来,回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身体不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她过世了。

院系调整,来到复旦

于:回国后我就回到了浙大,后来院系调整就到复旦来了,大概是1952年的时候。那时国内已经蛮安定了,我们走的时候“蒋家”管得乱七八糟的,这时已经安定了。

① 陈铁云,1918年生,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历任大连工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船舶结构委员会应用设计技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船舶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

② 蔡淑莲(1913—1969),福建仙游人,195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教授,专长分析化学。

③ 这个奖学金应为密歇根大学专门资助亚洲国家的女生到密大读书的巴伯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1918年设立。

房:回来以后很快就院系调整了?

于:对,院系调整,很快我就到复旦来了。那个时候浙大有个教授叫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但我最后还是选择来复旦了。我们复旦化学系是由七个学校调整过来的,由七个学校并起来的,七校并成了复旦新化学系^①。那时复旦的校区很小,以前的数学系和大草坪之间就是复旦了。我们从办公的地方走到宿舍去,中间都要经过农田。

李:学生是不是比较少?

于:刚刚并起来,学生比较多的,浙大化学系应该是只来了教师,没有来学生。但上海有的学校是师生一起并入复旦的。那么教室不够,房子不够,这些矛盾就比较突出。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房子很多都是后来新造的。复旦化学系老师原来是很多的,但是后来都跑掉了,可能和当时国家支内的政策有关系,本来七校合并以后有 10 个教授,到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都去支援其他学校、支援一些工业单位了^②。来复旦化学系的教授不少还是很有名的,因为支内,复旦化学系就变得不值得一讲了,复旦化学系当时名声不响了,因为教授都没了嘛。后来才慢慢好起来,陆续有许多老师回来,国外也有教师回来。

后来化学系要开高分子专业,我就调到高分子教研室去了,那时候我一个人要管高分子和化学系,可我一个人,管了高分子,化学系就管不了。因为就我一个教授。

房:高分子专业是哪一年开始筹办的?

① 复旦大学化学系始建于 1926 年,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与复旦大学七校的化学系合并,成为复旦大学化学系。

②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国家从复旦大学抽调部分教师支援兰州大学等兄弟院校,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大部分教授和一部分中年骨干教师被调走,以致造成有些课程停开的局面。这时于同隐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正如他在口述中提到的困难条件,他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一方面整顿和建设实验室,编写了《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等教材,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开出了有机化学教研室承担的全部课程,以后又带领中青年教师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于:呃,那个应该是 1958 年吧。那时候有的国家开始搞高分子研究了,但是中国还没有。我们学校也开始做,是因为中央的政策,中央的政策说要办高分子专业,我就调到了高分子教研室。高分子是新兴学科啊,“高分子”这个名字在 30 年代还没有呢。

万:您能通俗地给我们解释一下高分子这个学科吗?

于:你们知道化学也是研究分子的,但化学里面研究的分子比较小,高分子研究的分子比较大。每个分子都有量,分子量高的就是高分子。比如说普通的分子都是液体、气体,但是高分子因为分子量高就都成了材料,主要有三种:纤维、橡胶、塑料。高分子的应用是各方面的。那时是陈望道校长来找我,说要建立高分子专业。

高分子是化学的一部分,现在高分子已经发展到生物方面了,但这方面发展还不多。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别的国家没有单独成立高分子系的,只有我们中国高分子是独立出来的。

房:复旦是国内第一家做高分子研究的吗?

于:第一个也谈不上,科学院是第一个。科学院先搞,我们才有高分子系。其实当时高分子也不是建系啊,那时是搞运动嘛,搞献礼,那么高分子也是作为献礼的一部分^①。那时科学院要搞好多个新学科,成立了什么 101 所,102 所,103 所。101 所是数学,102 所是物理。高分子是 103 所。

我们高分子系的房子就是“大跃进”的年代造的,所以叫跃进楼啊。那个时候真的很苦,化学系嘛,总归要有水管、电线啊,可是我们却连电线、水管都没有,后来管子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可是 1958 年以后就搞运动了嘛,高分子楼就空在那里,真正有活动是到 1978 年以后了。前面都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说建立了高分子系,但是工作很少的。

^① 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科研与高教系统也卷入浪潮中,举行“跃进誓师会”,以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成立新学科等方式向“大跃进”“献礼”。1958 年开始,复旦的高分子研究也是举国上下众多“献礼”工程中的一个。

1978年以后,才开始蓬勃发展^①。

万:“文革”期间,您有没有受到影响啊?

于:哪一个人能不受影响啊?“文化大革命”所有教授都要进“牛棚”的啊。虽然我是最后一个进“牛棚”的,但也不能幸免啊。

那时候就是对不同的人政策不一样,对年纪比较大的啊,年纪在40岁以上的都要审查。也不是说对你们一起进行审查,是一个个走进去(苦笑),都需要进行审查的。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出过国的人以前办手续不是都要经过美国领事馆的吗?美国领事馆的材料都被他(指政府)拿去了,有些事情也很奇怪,来审查我的人,拿着从领事馆拿来的材料,说你的签名在这里,我说这个签名明明不是我的嘛,一点都不像我的。这是国民党搞的花样经啊!于是审查的人叫我签个英文名,看看笔迹对不对,一看美领馆的材料上的签名跟我自己的签名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国民党和美国领事馆伪造的签名。所以他们要一个一个审查啊^②。

房:“文革”十年,您基本上就跟学术脱离了吗?

于:那个时候不是有“四人帮”啊,“四人帮”他要一个写作班子吗,我们就被编到“四人帮”的这个写作班子里去了。我们复旦实际上也有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的领导人是“四人帮”的姚文元。上面搞了一阵子,就把你调到这个写作班子里去了嘛。我们想写一部中国人

^① 江明院士在回忆文章里称,“实际上复旦高分子的教育和研究从58年就开始了。当时于同隐先生带领一些年轻的教师包括我们提前毕业的一些学生,开始创办这个专业。首先就是把本科的一些课程建立起来,像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也做一些研究。当然研究的水准是谈不上的,因为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文革’以前的阶段,主要打了一些基础,通过先建立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人,每一届大概招30个同学。一直到65年毕业了五六届的同学,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骨干。‘文革’期间还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见江明:《我在复旦的日子——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江明教授访谈录》, <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3748>。

^② 解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运动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方法要求知识分子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于同隐先生回忆的这段审查经历就是“洗澡”运动的一部分。

自己的可以跟马、恩著作相抗衡的作品,这怎么可能呢?“文革”后期,我们也开始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但那哪是老师教学生啊,那是工农兵学员教育老师啊!真正重新开始研究工作要到1978年以后了。

高分子学科大发展

于:主要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正式展开要到1978年以后,但这以前也做了一些,翻译了一些,也编了中文的教材,不过都不是前沿的。到1978年以后呢,科研工作、教学工作都做得比较正规了,教材也比较正规了。到1978年以后主要靠实验,主要写论文了。

高分子学科中国恐怕比美国还要搞得早,但是我们1958年就只是出了这么个名字,没好好搞呀,很快就被美国超过了。刚开始的时候高分子的学生一年招一个班,一个班有30人吧。教师起初比较少,后来就慢慢增加了,教师外面请也请不到,增加的老师很多都是从这些学生中成长起来的。

1977年,我们开始招研究生了,当然大部分都是学化学出身的。杨玉良^①就是那时候读研究生的。他1973年读化学系的本科,我教他们有机化学的。他大概1977年、1978年开始读研的。他脑子很灵,恐怕是中学没有读完就直升到大学了。他是真的问题多啊,经常跑来问问题。他这个数学比我好,他的毕业论文主要是靠他自己来完成的,我们这代人数学没他好。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和他们班的人一起被派到胜德化工厂去搞科研,那时候要下厂嘛,我跟学生们住在一起。在那个厂里工作

① 杨玉良,1952年出生,浙江海盐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同年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于同隐教授。1986年赴当时的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 Spiess 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的时候,杨玉良就写了两篇论文,当时就已经是最突出的,杨玉良在厂里面也是个人物啊。

杨玉良跟他爱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也不能说认识,他们是同班同学,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但去工厂后才接触多了。后来杨玉良又考了研究生,他爱人没有考,那个时候取的研究生太少,他爱人就到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去工作了。

房:跟杨校长前后届的学生里,还有哪些是您印象深刻的?

于:江明^①啊,府寿宽^②啊,都是我的学生。高分子现在所有的“头头”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个四川大学的副校长^③嘛,他是四川派来复旦学习的。

房:1978年以后,国家对高分子这个学科的重视程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于:高分子是从化学系分出来的,原本只是化学系的教研组,没什么了不起的。化学是个基础学科,高分子原本只是其中一个专业教研组。后来材料系从化学系分了出来,高分子是搞材料的,就成了材料系的一部分;最后高分子又从材料系里分出来,才成立了高分子系。要是高分子一直绑在化学系里面啊,恐怕也很难发展起来。

房: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① 江明,1938年出生,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1981年为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Polymer Journal》杂志顾问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学报》、《功能高分子学报》、《应用化学》编委等职。

② 府寿宽,1940年生,江苏吴县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1965届研究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和东密歇根大学涂料研究所(Coatings Research Institute,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担任访问学者和访问科学家。现任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Journal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高分子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等重要学术期刊编委。

③ 李光宪,1955年出生,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年在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博士毕业。

于:我退休的时候早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啦^①。到了70岁,我还在做研究,带研究生^②。以前我们搞科研很苦啊,什么经费都没有,完全靠自己动手,那时候跟学生接触很多。我连器械也买不起啊,那时候器械很少,国家的经费也很少的,只有项目通过了,才有研究经费,有经费才能买仪器啊。那个时候很多仪器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我们好多高分子实验的实验器材都是自己做的啊。从前那些东西都比较基础,仪器相对也比较简单,买国外的买不起,就自己动手做。有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做。大多数都是自己买一个这个配件,再买一个那个配件,装配起来的,主要做一些简单的设备,尽可能去满足学生的需求。

研究生主要还是靠他们,他们的研究还是靠他们自己。高分子有个特点,你们可能不大了解,高分子里面分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我是学化学出身的,对高分子化学还有所了解,但是高分子物理是根本不懂。在分子系建立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教高分子物理的,可是研究生很多是搞物理方面的,但我自己并不懂。高分子化学嘛,我们比较容易掌握,物理方面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什么都没

① 于同隐1989年退休,时年72岁。退休后,他仍担负着培养博士生和指导博士后研究的工作,退而不休。

② 在于同隐退休后(1989年)进入当时的材料系高分子专业就读的明伟华博士(现任荷兰埃因霍温工学院高分子化学和涂料工程系副教授)在回忆学生时代时,还记得于同隐当过他的导师。“我们系的于同隐老师、府寿宽老师还有江明老师等,那时候就作为科研中坚工作在第一线了。府寿宽老师和于同隐老师都曾作过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于老师现在在科研上还非常活跃,他是我们系的开山鼻祖,没有他就没有高分子系。他有很多特点。首先是颇具前瞻性眼光,能预见到新兴的发展前景。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蜘蛛蛋白很重要很有意义,就开始对蚕丝进行深入研究。他早过了退休的年龄,一般人这时候都该颐养天年了。但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培养了很多的博士。其中的邵正中眼下就在领导课题组继续于老师的研究。第二,他很宽容,给予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江老师和府老师,包括杨玉良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他从来不去干涉人家,施加压力。现在国内和国外很多学术上的大家有学霸作风,排挤新出现的不同观点。于先生是很提携后辈的,那时候系里已经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了,各个课题组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还有就是于先生对待自己的学生和蔼可亲,可一旦涉及学术,他可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有学生不能按时交作业,他绝不会就这样放过去的,尤其是对研究生,绝不马虎。这对我现在带学生有许多榜样之处。”见明伟华:《回忆我的大学时光》, <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4043>。